导　　论

时间与择吉

人类就要结束 20 世纪的百年历程了！回眸历史，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科学与迷信、民俗与教化，倍受关注！有人说：在活着的科学家中，最杰出的当数美国的霍金，他写出了《时间简史》这部有关时间的著作，他是继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在时间学说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时间，并且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可惜我们当代中国学者几乎无人研究这个课题，以致于在这方面是个空白。我们愧对祖先！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尧典》就提出"敬授人时"。尧时的羲和就是测定太阳的专职官员，以便掌握时间。尧的后继者舜提出"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见《舜典》）到了周代，无论政事，还是农事，都严格依据天时，《周礼·地官》说："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春秋时的哲人总结经验说："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左传·文公六年》）

为了掌握时间，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独特的天文学体系和二十八宿，绘制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东汉就有了水运仪象台。中国先哲在测定回归年长度、测定交食周期、测定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点月长度、测定黄赤交角、实测物候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什么中国先民如此重视时间？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农业对天时依赖性大。不重视时间，就是自取灾殃。

关于时间，中国先民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但是，择时观念长期与民俗、与术数、与吉凶预测联系在一起，具有很浓的神秘性。“六经之首，群艺之源”的《周易》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史记·天官书》：“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这就使时间打上了方术烙印。

在先民看来，时间与吉凶这两个概念是人体与影子的关系。时间被神化，《尚书·益稷》说“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时间就是天命，不得违忤。圣王法天以立教，以时为宪。所以，《淮南子·要略》反复强调恪守时运：“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

择时意识，在民俗、农事、建筑、征战、医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试以医学为例：

祖国医学以朴素的系统思维看待疾病，认为人体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关系，自然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年、月、日、时，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亦不同。因此，人们应依据时间规律而选择生活方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择时的论述，在祖国古代医书中比比皆是。如《黄帝内经素问》卷一《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指出：“善摄生者，无犯日月之忌，无失岁时之和，须知一日之忌，暮无饱食；一月之忌，晦无大醉；一岁之忌，暮无远行；终身之忌，暮无然烛行房，暮常护气也。”在古代医学家看来，时间是一个变数，如果人不能顺应其

变，违背了自然规律，人体就会不适，倒霉的事就会发生。孙思邈在《千金宝要》卷六举例说：“四时之气皆能为病，其伤寒尤重，以其杀厉之气故也。辛苦之人，春多患温病，以冬时多触冒寒冷所致。时行之气，犯之多病。所谓时行之气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

有人认为传统医学用现代医学理论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黄帝内经》等古代医书皆属荒唐不稽。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医学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过巨大贡献，中医的择时论有极大的合理性。择时医学应成为当代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养生和治疾，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生在世，谁不希望平平安安，趋吉避凶，逢凶化吉。传统医学以趋吉为方向，以择时为手段之一，有待于人们重新认识和发掘利用。

广义的择吉与狭义的择吉

择吉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迷信，有人说是禁忌方法，有人说是术数。《辞海》和《辞源》的“择吉”条解释为“择定吉日”。

笔者认为择吉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

先谈广义的择吉。

择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俗，一种心理和行为趋向，一种对时间的认知，一种对信息反馈的决断，它是有经验成分、科学成分、迷信成分、众多知识成分的文化现象。广义的择吉不限于日期，吉的内容很宽泛。《说文》：“吉，善也，从士，从口。”《逸周书·武顺》：“礼义顺祥曰吉。”可见，善、顺之事都是吉。

择吉就是要回避或清除不吉的因素。《聊斋志异·潍水孤》记载：“我将久居是，所以迟迟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后耳。”所谓涓吉，就是择吉。涓，本意为细流，引申为清除。

择吉的观念或许与人类社会相始终。早在原始社会，北京山顶洞人就在死者周围撒上一圈赤红色铁矿粉，这种行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原始人以红色代表火，火代表生命旺盛，代表驱赶黑夜和邪恶，代表吉祥的运气和光明的未来。以红色代表吉祥的观念，这种情况一直保存到后代。皇帝的宫殿陵寝、佛教道教庙宇都以红色为装饰色，民间风水以红色镇邪，都沿袭了原始择吉观念。

原始社会的人还盛行图腾崇拜，氏族以龙、凤、虎、狗、牛等为吉祥物，认为它们与本氏族有某种神秘的默契，可以保佑本氏族。王充在《论衡·初禀》说：“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吉物动飞而圣遇也。”可见崇拜动物也是择吉行为，它给古代先民以心理上慰藉。

古代择吉的形式很多：

择物，佩物择吉，以玉佩、石佩戴在身上，用以美饰和避邪。《山海经》记载有个招摇山，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丽膺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二三千年前的人就知道把大自然中的东西佩戴在身上，可见这种择物求吉的习俗是多么悠久，难怪现代人仍喜欢佩戴护身符或金玉之器！

择吉土，选择地点。《礼记·礼器》：“因吉土而享帝于郊。”《注》云：“吉土，王者所占而居之土也。”先民以占卜的形式选择适合居住的地点，为的是吉多凶少或无凶无灾。

择善言。善言即吉言，听了对人有益。善言不是恭维话，而是有利于人们进步的劝告。《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去恶从善，是谓

趋吉。

择友邻。战国时孟母三迁的故事，脍炙人口。孟子有了好的环境，使他能很快成长。《史记·苏秦传》说得好，“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吉利的友邻环境，正是人们渴求的，为的是减少不测因素。

民间择吉，必得避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避凶的方法有很多，如口念咒语“元亨利贞”、“姜太公在此”、“阿弥陀佛”等，在调整心态上有作用。有的人在宅前屋后置桃符、铜镜、石敢当，这也是自己安慰自己。有的地方举行傩仪、祭祀，求助于神，最终目的还是求吉。

再谈狭义的择吉。

古代的择吉，主要是指择日。方术的择吉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吉凶神煞为推算依据，选择吉日吉时，确定趋避。狭义的择吉又称为涓吉、谪吉，它不是孤立的方术，仍与太乙术、六壬术、奇门遁甲术、堪舆术、占星术紧密相连。

先秦时代已很流行选择吉日。民间以每月初一为吉日。《周礼·天官·大宰》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诗经·小雅·小明》记载：“二月初吉，载离寒暑。”

秦汉有专门为民众和朝廷选择日子的方士，称为日者。司马迁在《史记》写有《日者列传》，这说明当时的日者在社会上很活跃，有较大影响。到了明代，择吉家仍被称为日者，陶宗仪在《辍耕录·日家安命法》说：“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计罗炁孛四余气躔度过宫迟留伏逆，推人之生命月日时，可以知休咎，定寿夭。”人们在干任何事情时，除了空间就是时间，在什么时间适宜干什么事？日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中国古代举行大事，没有不选择日期的。选择日期到底有没有好处，先民不太理会。在他们看来，选日总比不选日好，相信民俗总比不信好，何况选了日期可以调动民众信心，并且还有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些成功的实例在先，何必不选吉日呢？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成功了，甲子日就成了吉日，所以，在农历上的甲子日是百事咸宜。

择日之所以必要，这与诸多的日期禁忌有关。如父母的去世日，皇帝的去世日，禁止饮酒狂欢，禁止婚娶。民间在九月初九流行“登高以避凶”的活动，传闻起源于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见本书《荆楚岁时记》。每一种禁忌，不一定有道理，或者还很荒唐，但都有来龙去脉，随着许多人采纳这种禁忌，成为共识，就成为了普遍的民俗。

择吉元典

接下来要谈谈择吉元典。

谈到择吉元典，不能不提到新发现的考古资料。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地虎秦墓发掘了大批秦始皇时期的竹简。经整理，确定其中有许多前所未知的文献，如《日书》（甲种）、《日书》（乙种）都是久已失传的择日趋吉文献，并且可以称之为择吉方术的元典。

《日书》（甲种）记述了秦国和楚国的月份，保留了楚国月名的特殊叫法，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秦楚月份的对应关系。当时已用十二支表示十二时，如“日出卯，食时辰”、“下市申，春日酉，牛羊入戌，黄昏亥”等。

秦竹简错乱多，字迹残缺，现在很难卒读，尚有待考证整理，因此，本书没有选择《日书》作注评。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汉代墓葬的竹简上也发现有关择日的资料，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元光元年（前 134 年）历书，竹简文字有农历节气和三伏凶日，涉及吉凶预测。但是，这些材料都是只言片语，不成文章，所以也没选录于此书。

对于元典，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元典就是某类经

典的第一部书。有人认为元典的涵义可以更广泛一些。元，文字学的意思有开始、善、原来、玄。笔者在注评择吉元典时，选目侧重于有代表性的典籍。在每篇注评之前都有导读，简述了该书该篇的情况。这里，对其他的有关选时择吉书作简要介绍。

1.《夏小正》

中国先民很注重生态与灾异的时间性。不同的年份、月份，生态就出现不同的物象，人们必须按照生态的规律办事。至迟在四千年前成书的《夏小正》就是最早的农家月令历书，它被收入《大戴礼记》。《夏小正》按夏历十二月的顺序讲述每月的星象、物候、农事及文化。全书仅 473 个字，但史料价值很大。《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可见先秦学者已很重视这部古老的月令。

《夏小正》所述月令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向；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初服于公田。

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万用入学；荣堇采蘩；昆小虫，抵蚳；来降燕，乃睇；有鸣仓庚。

三月：参则伏；攝桑；委阳；颁冰；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越有小旱；田鼠化为鴽；鸣鸠。

四月：鸣杞；囿有见杏；王劳秀；越有大旱；执陟攻驹。

五月：参则见；浮游有殷；鸡则鸣；初昏大火中；煮梅；颁马。

六月：煮桃；鹰始挚。

七月：秀雚苇；狸子肇肆；惶潦生苹；寒蝉鸣；时有霖雨。

八月：剥瓜；玄槁；剥枣；丹鸟羞白鸟；辰则伏；鹿人从日。

九月：主夫出火，陟玄鸟蛰，荣鞠树麦。

十月：豺祭兽；黑鸟浴；玄雉人于淮为蜃。

十一月：王狩；陈筋革；陨麋角。

十二月：鸣弋；元驹贲；纳卵蒜；虞人入梁。

以上文字过于简扼，颇难解释。但大致可以知道飞禽走兽在当时的生活规律；亦可知道农夫们每月忙碌的事情；还可知道贵族们的祭祀和赏赐活动。如“初岁祭耒”“初服于公田”“万用人学”颁冰’都是与文化有关的事项。以‘万用入学’为例，当时选择仲春月的丁亥日为吉日，乐官练习干戚舞，献于大学，作为一种庆典活动。

如果说《夏小正》载录的是夏朝月令，那么，反映周代月令的当推《诗经·国风·七月》。《七月》描述的是豳邑（今陕西邠县西）一带的农事和文化，沿用了夏历（周历建子，夏历建寅），按月叙述．如：

>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没有《夏小正》系统，但却有文采，朗朗爽口。全诗八章八十八句，是采诗者根据民间流传的诗歌改编而成。《夏小正》与《七月》之间有什么关系，到底谁先谁后成书，都值得今后探讨。

由《夏小正》开创的月令体裁农历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东汉崔寔撰《四民月令》、唐末韩鄂撰《四时纂要》都是按月叙述天文、气象、占候、种植、修造等，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此外，宋代有《岁时广记》，元代有《农桑衣食摄要》，明代有《便民图纂》，清代有《沈氏图书》。近代以来的农历书，大抵是这些月令书的延续。

有必要说明的是，先秦各国所用历法不统一，这对于我们研究生态、特别是物候带来许多麻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误解。林剑鸣先生曾经指出：“《春秋》和《孟子》多用周历，《楚辞》和《吕氏春秋》多用夏历，而《诗经》一书中则因篇章不同而异，如《小雅·四月》用夏历，所以诗中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豳风·七月》却夏历和周历并用。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说：‘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当是指周历，即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需雨之时；若是指夏历七八月则为周历的九十月，那时禾已长成，田已无苗，上述话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对先秦的生态现象必须小心求证，要把夏历、殷历、周历的岁首搞清楚，然后细心推算。

2.《管子》

了解万物变迁，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注意季节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生态亦不同，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活动亦不同。《管子·四时》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

春天时，“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这时宜于敬神谨祷，治堤防，修沟渎，正阡陌，种树木，不伤动物。如果“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

夏天时，“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这时宜“令禁置设禽兽，毋杀飞鸟”，如果“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秋天时，“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这时宜“补缺寒坼”，量民资以畜聚。如果“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

冬天时，“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这时宜“毋发山川之藏”，如果“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生态是否完美和谐，就看四季。如果四季失常，则说明生态

有乖，即出现贼气。“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速至，贼气速至，则国多菑殃。”

《管子·七臣七主》也表露了同样的观点，提出：“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飘屋折树，暴火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

管子的主张是春天实行春政，夏天实行夏政，秋天实行秋政，冬天实行冬政。四季有四政，实质上是要遵守生态规律，不可违忤自然，如果人的政务违背生态，生态必然加害于人。生态之所以会加害于人，原因在人。因此，人应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管子》的作者不详，有人说是战国秦汉间管仲学派的弟子撰写汇编了此书。

3．《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秦国相吕不韦使门客各著所闻，撰成《吕氏春秋》，是为诸子杂家代表作。全书反映了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思想，并且内涵了丰富的时间与文化思想。

《吕氏春秋·十二纪》按照每年十二月依次叙述生态、物候、农作、文化，比《夏小正》详细得多。如：

孟春（夏历的正月）是一年之始，这时的生态情况是：“日在营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这时的天子“载

青旗，衣青衣”，在立春之日“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这时的农耕文化是“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田。……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

仲春（二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奎”、“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政务文化是“省囹圄，去桎梏”、“无作大事，以妨农功”、“祀不用牺牲”。农耕文化是“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必备”。

季春（三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胃”、“桐如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政务文化是“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仓绝”。农耕文化是“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劝蚕事”。

孟夏（四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毕”、“蝼蝈鸣，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政务文化是“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农耕文化是“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仲夏（五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东井”、“螳蜋生，鵙始鸣”、“半夏生，木槿荣”。政务文化是“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农耕文化是“祈谷实”、“无用火南方”。

季夏（六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柳”、“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蚜”。政务文化是令官吏养牺牲，以供祭祀之用。农耕文化是谨防水患“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

孟秋（七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翼”、“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政务文化是“天子亲率三公九卿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命有司，修法制”。农耕文化是“农乃升谷，天子尝新”、“修宫室，附墙垣，补城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仲秋（八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角”、“凉风生，候鸟至，玄鸟归，群鸟养羞”、“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政务文化是“养衰老”“斩杀必当”、“巡行牺牲”。农耕文化是“穿窦窮，修囷仓”、“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劝种麦，无或失时”。

季秋（九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房”、“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政务文化是“申严号令”、“尝牺牲”、“制百具”、“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农耕文化是“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

孟冬（十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尾”、“水始冰，地始冻，雉人大水为蜃，虹藏不见”。政务文化是“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命太卜，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谨盖藏”“循行积聚”。农耕文化是“审棺槨之厚薄，营丘垄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劳农夫以休息”。

仲冬（十一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斗”、“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政务文化是“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君子斋戒”。农耕文化是“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季冬（十二月）的生态情况是“日在婺女”、“雁北向，鹊始巢，雉雊鸡乳”。政务文化是“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农耕文化是“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在先民看来，十二个月的周期转换，本质上是阴气和阳气的循环往返。当阳气始生时，草木就会萌动；当阳气在上时，草木则盛旺；当阴气逐渐增多时，阳气必然减退，大地就到了秋冬，万物凋零。这种阴阳观是朴素的直觉，是经验的总结。

在长期的实践中，战国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政令与时节必须保

持协调一致。如果政令乖忤时节，必然有生态灾害。根据《吕氏春秋·十二纪》，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月令灾异表

令 月	春　令	夏　令	秋　令	冬　令
孟春		风雨不时 草木早槁	民大疫，疾风暴雨	水潦、霜雪 首种不入
仲春		大旱　暖气早来　虫螟为害	大水、寒气至	阳气不胜 麦乃不熟
季春		民多疾疫 时雨不降	天多沉阴 淫雨早降	寒气时发 草木皆肃
孟夏	虫蝗　暴雨 秀草不实		苦雨数来 五谷不滋	草木早枯 后乃大水
仲夏	五谷晚熟		草木零落 民殃于疫	苞霰伤谷
季夏	谷实解落		丘陵水潦 禾稼不熟	寒气不时
孟秋	旱　五谷不实	火灾　虐疾		阴气大胜 介虫败谷
仲秋	秋雨不降	旱		风灾　草木早死
季秋	暖风	大水		不宁
孟冬	冻闭不密 地气发泄	暴风	雪霜不时	
仲冬	虫螟 水泉减竭	旱	雨	
季冬	胎夭多伤	水潦	白露早降　介虫	

此外，与择时相关的上古文献还有：

《礼记·月令》，《月令》是《礼记》的一篇，也曾单独刊行。有人认为，《月令》不是周代的作品，而是好事者从《吕氏春秋》摘录改编而成。该篇按月叙述自然现象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是汉代刘安组织门客编写的，其中有《时则训》专讲四季十二月常法，如季秋之月“命有司申严号令，百官贵贱无不务人，以会天地之藏”。内容与《月令》相似。

以上这些书都有务实的特征，以天人合一为宗旨，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告诫人们不违天时，因天时，就地利，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晚清，在西北敦煌鸣沙山石室发现一批唐代手写古籍，近人据此编有《敦煌石室遗书》、《敦煌石室真迹录》。在这批敦煌遗书中，有一些择吉书。如《七曜历日》见于敦煌遗书（伯二六九三号），没著撰者名氏。书中的七曜日分别是蜜、莫空、云汉、嘀、温没斯、那溢、鸡缓，据说这是康居语。每日分十二时，每时之下缀以吉凶祸福，使人知道趋避。七曜，日本人至今还在采用，即汉语用日月水火木金土表示，每周七曜日，周而复始，敦煌七曜日有如下禁忌：

蜜日（星期日）忌吊死、问病。

莫空日（星期一）忌裁衣、剃头。

云汉日（星期二）忌聚会作乐。

嘀日（星期三）忌出行。

温没斯日（星期四）忌恶言。

那溢日（星期五）忌殡葬。

鸡缓日（星期六）忌出财。

这些禁忌依据了什么理论，现在尚不清楚。可能是唐代摩尼教徒从中亚康居国传入的术数。

到了明清时代，趋吉的书籍有了特别浓厚的神秘成分，阴阳五行学说与神煞宜忌学说贯穿其间，文字艰涩，内容朦胧，是是而非，读起来令人如堕云雾。如明代高濂在《居家必备》有《选择历说》；董潜撰《诹吉新书》；董银峰撰《长历钩玄》；周于德撰《择日便览》；甘霖撰《选择通书秘窍》；黄复初撰《尅择部》；胡泰撰《趋避检》。清代李光地等撰《星历考原》；允禄等撰《协纪辨方书》；倪荣桂辑《选择当知》；姚承舆撰《择吉会要》；张祖同辑《诹吉述正》；佚名氏撰《三历撮要》。试介绍两部：

《三历撮要》，又名《择日撮要历》。它是依据《百忌历》、《总圣历》、《集正历》等历书摘要辑成。全书以每年十二个月次第排列，按月载录嫁娶、求婚、上官、出行等吉目，所列神煞有河魁、天罡，丛辰家和建除家诸术并用。书末附有趋吉资料：万通历吉凶图说、九官上宫兀星诀、猖鬼败亡日、九天玄女选时诀、逐月选时法、推月将法、推十二神吉凶。

《协纪辨方书》为清朝乾隆皇帝钦定，其中本原二卷、义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录·辨伪各一卷。据《四库提要》云：“盖钦天监旧有选择通书，体例猥杂，我圣祖仁皇帝尝纂《星历考原》一书以纠其失，而于通书旧本尚未改定。是书乃一一驳正，以祛群疑。”该书一直是清代编黄历的依据。笔者主编的《中华方术典籍丛刊》载有刘道超译注的《协纪辨方书》上下册，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可资读者参考。

趋吉术语探微

趋吉术语，清代四库馆臣已有一番考证，认为战国萌生趋吉

术，汉代盛行，所谓的神煞不过是一些代号而已。《四库全书·星历考原提要》论其源流说：

> 考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其日以卜不以择。赵岐《孟子注》天时为孤虚王相，则战国时已渐讲之，然神煞之说则莫知所起。《易纬乾凿度》有太乙行九宫法。太乙，天之贵神也。《汉志》兵家、阴阳家类亦称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助。又阴阳家类称出于羲和之官，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则神煞之说，自汉代已盛行矣。夫鬼神本乎二气，二气化为五行，以相生相克为用，得其相生之气则其神吉，得其相克之气则其神凶，此亦自然之理。至其神，各命以名。虽似乎无稽，然物本无名，凡名皆人之所加。如周天列宿，各有其名，亦人所加，非所本有，则所谓某神某神，不过假以记其方位，别其性情而已，不必以词害意也。

概言之，神煞不过是人取的方位代名词，依五行生克关系而划定其吉凶的属性。方术开口闭口讲神煞，听起来够吓人的，实际上是故弄玄虚，以之作为特定时空的代号，诸如游祸、九神、月破、小耗、五鬼，都类似于西方的 ABCD 符号而已，只不过更生动形象、引人注意而已。

神煞的理论根柢，是从庞杂的术数义理东拼西凑而来。《星历考原》卷六《选择总论》指出：

> 吉凶之说，昉于《易》，衍于畴，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而教人卜筮，以为趋避之宜者也。然阴阳既分，刚柔定位，五行顺布，则生克无端，干支相推，则冲合互见，以及纳音纳甲派而枝分八卦九宫，同条而共贯，皆推原

于易理，根柢于图、书，论日以繁，术日以巧，是不可谓理之所必无而亦势之所必至者也。三代而后，阴阳家者流各出其说，以鸣于世，亦已纷矣。况一日之间有吉神，又有凶神，且有一神而异名者，异其名异。又有一为吉，一为凶者。夫神煞之名，不过即五行之生旺休囚，干支之刑冲合会以为断耳。术数之徒乃其言其吉凶，以骇众而震俗，偶有所检，群焉信之，而古之立说茫乎，莫知其所由来矣。

可见，“骇众而震俗”的趋吉术语不过是术士的大拼盘，在上古没有理论依据，在后世也没有经过检验，想怎么编就怎么编，阴阳五行学说被杂糅，从战国以后逐渐形成了神秘而复杂的理论。

考稽史料，趋吉术语有一个由简单变为艰涩的过程：

殷商的巫十以占卜和摆筮推测吉凶，依裂纹和筮数，一目了然。

春秋战国时代用干支为基本术语。《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谏阻，认为不宜，他说：“窃观《金柜》第八……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丑，辛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为太常所临亥，大吉，得辛为九丑，又与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天地行殃，祸不久矣。，”可见，伍子胥是以日期推测征战胜负。

到了晋代，人们择日要参照历史典故，力求找出一些对应的关系，《晋书·戴洋传》记载：“元帝将登祚，使（戴）洋择日，洋以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陈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国，范蠡称在阳之前，当主尽出，上下尽空，德将出游，刑人中宫。”晋元帝即位，在日期方面发生了争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